

# “我经华原来”：杜甫北征途中缺失的一环

——《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作年问题考辨

孙 微 王新芳

**摘 要：**旧注多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杜甫由奉先北上逃难之时，然诗云“我经华原来”，这与天宝十五载杜甫的逃难线路并不相符，且史籍中并未记载是年夏三川及其附近地区发生过水灾。通过检索新、旧《唐书·五行志》《册府元龟》及杜诗所载可知，开元十五年、十六年，天宝十二载、十三载，至德二载这五次水灾与杜甫及三川有关，其中至德二载秋关中地区雨灾应为《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之历史背景。杜甫于是年闰八月初一由凤翔出发北征，途中亦经三川，此次北征路线为凤翔、麟游、邠州、华原、宜君、三川、鄜州，恰可与诗中“我经华原来”之语相关合。由于历代注家未能详考杜甫由邠州至宜君之具体路线，不知华原乃邠州至宜君的必经之地，故一直未能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进行准确系年。厘清此诗系年后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杜甫北征的行经路线及途中经历，从而加深对《北征》等诗的理解，亦有助于消除学界此前的某些误解。

**关键词：**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年厘正；华原；《北征》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6)01-0153-08

杜诗旧注一般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756)七月，认为此诗是安史之乱初期杜甫携家避难途经三川时所作。此种编年结论一直被沿袭下来，为当代学界所接受。然而此诗开头云“我经华原来”，这与安史之乱初期杜甫携家逃难的路线并不完全相符，故对此种编年结论仍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 一、旧注关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编年依据及其存在的矛盾

宋代注家均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编于天宝末年的依据是什么，如此编年又存在哪些问题与矛盾？兹试作分析如下。

### (一)宋代注家的编年依据考辨

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曰：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脰蹙。蓊匐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礧礧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不有万穴归，何以尊四渎。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门，回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何时通舟车？阴气不黤黠。浮生有荡汨，吾道正羁束。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局。普天无川梁，

收稿日期：2025-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杜甫生平事迹新考”(21YJA751022)。

作者简介：孙微，男，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王新芳，女，文学博士，齐鲁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200)。

欲济愿水缩。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sup>[1]</sup>372-377

除黄鹤本外,旧注均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认为是杜甫携家逃难经过三川时遇山洪泛滥所作,这是因为宋本《杜工部集》于题下注曰:“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sup>[2]</sup>《杜甫全集校注》曰:

题注,钱钞本、宋九家本同……宋百家本、宋分门本、元分类本无此题注;宋千家本、元千家本作“天宝十四载作”。今按:以上二首题注编年,千家本同,俱冠以“洙曰”二字,见前。此首千家本编年不同,故别出题注,不以为洙说,而引鲍曰,与此注意同而文繁。鹤又谓“鲍注与梁权道所编皆以为天宝十五载作,蔡兴宗以为五月避地鄜州有此作,而鲁尝以为七月寓于鄜州有此作”云云。宋分门本、元分类本引鲍曰、鹤曰,并同。<sup>[3]</sup>731

可见此题注并非“公自注”。考证宋本《杜工部集》乃是王洙于北宋宝元二年(1039)编成,又由王琪于嘉祐四年(1059)刻于苏州,其刊刻时间比《新唐书》的成书时间尚早一年,因此宋本《杜工部集》中《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题注“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并非来自《新唐书·杜甫传》,应为王洙所加。北宋吕大防《杜工部年谱》于“至德元年(天宝十五载)”曰:“是年肃宗即位,改至德元载。夏五月,甫避寇左冯翊,逆旅鄜时,有《白水高斋》《三川观涨》诗。”<sup>[4]</sup>其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夏,显然是受到宋本《杜工部集》题注的影响。此后南宋赵子栎和鲁尝的《年谱》均承袭此说。

较早承继此说的宋代注家则是鲍慎由(字钦止),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题下注“天宝十四载作”,其解题曰:

鲍曰:天宝十五载乙亥,禄山陷京师,公徒步避寇鄜州三川县有是诗,时七月也。《补注》鹤曰:……鲍注与梁权道所编,皆以为天宝十五载作。蔡兴宗以为五月避地鄜州有此作,而鲁尝以为七月寓于鄜州有此作。然诗云“我经华原来”,按公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自京兆之奉先,明年夏自奉先之白水,赋《高斋》诗已是五月。又自白水之鄜州,故回经华原。是年,史不书水并雨,而今诗言水为甚,考《彭衙行》亦云“一句半雷雨”“竟日数里间”,故此诗亦云“云雷屯不已”,是公去白水北行即值水,亦可以补史之阙。鄜州在冯翊之北,而彭衙亦在冯翊、白水县

之北,殆是赴灵武时所经如此。其曰“华原”者,谓华原郡。北至防州百八十里,防北至鄜百十里耳。冯翊在华原东百八十里,岂非公自白水西北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防,复自防北至鄜也?后有《玉华宫》诗,可知至防无疑。玉华宫,在防州宜君县。<sup>[5]</sup>

黄鹤之所以将此诗编于天宝十四载,大概是因为他注意到《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并未涉及战乱内容,但他同时也同意宋本题注及鲍钦止将此诗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故其解题与题注之编年有些自相矛盾。黄鹤还称杜甫此次逃难路线为“自白水西北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防,复自防北至鄜”,其实杜甫此次逃难并未经由华原、坊州,《玉华宫》亦并不作于此次逃难途中(说详下文)。黄鹤可能也注意到了其所云逃难路线存在问题,故将诗中的“华原”模糊地解为“华原郡”。悬揣宋本《杜工部集》的编者和宋代注家非要将此诗系于天宝十五年七月之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发现三川为天宝十五载夏杜甫由奉先至鄜州逃难路上的必经之地,而《杜工部集》中《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一诗在题目中便有“三川”之名,遂认为此诗必作于此次逃难途中,并未细考诗中提及的具体路线;又因《彭衙行》中有“一句半雷雨”“竟日数里间”的描写,遂将其与三川水涨进行对应。殊不知杜甫曾两次经过三川,天宝十五载北上鄜州逃难只是其第一次途经三川而已;杜甫一家逃难至彭衙时已是六月,正值雷雨季节,故在诗中有所反映,然将“一句半雷雨”与三川水灾进行对应亦存疑问。

除此之外,宋代注家鲍慎由等人如此系年还有可能是受到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的影响,因为《新唐书·杜甫传》曰:“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sup>[6]</sup>5737其中提到杜甫在安史之乱初起时曾“避走三川”。按,关于杜甫于安史之乱初起时行迹的描述,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曰:“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sup>[7]</sup>《旧唐书·杜甫传》曰:“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sup>[8]</sup>5054以上两种史料均未载杜甫曾“避走三川”,仅《新唐书·杜甫传》有这样的记载,这是其与此前文献的不同之处。那么为何《新唐书·杜甫传》会增加此前未见之信息呢?这是因为宋祁在重新编撰《杜甫传》时据杜诗所载进行了增补改写,遂使《新唐书·杜甫传》比《旧唐书·杜甫传》和元稹

《墓系铭》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造成了文本的差异。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sup>[6]</sup>5738,这条信息便直接来自杜甫《遣怀》:“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sup>[1]</sup>1748 同样地,当宋祁看到宋本杜集中有《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而其题注又有“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这样准确的系年之后,便将其写入《杜甫传》中,这应是《新唐书·杜甫传》中增加了“甫避走三川”这条新信息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鲍慎由《注杜诗及文集》成书的时间要远晚于《新唐书》,《新唐书》成书于嘉祐五年,元好问《中州集》乙集祝简小传引祝氏《诗说》云:“予政和丁酉任洺州教官。是时,括苍鲍慎由钦止出所注《杜诗说》。”<sup>[9]</sup>因此鲍慎由《注杜诗及文集》能够参考《新唐书·杜甫传》是确定无疑的。

## (二) 旧注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如前所述,宋本《杜工部集》的编者王洙以及宋祁、鲍慎由等人因注意到安史之乱初起时杜甫曾携家由奉先、白水逃难至鄜州,途中必经三川,故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然而如此系年会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所载行经路线与天宝十五载杜甫的逃难线路不符。此诗开头云“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可见杜甫此行乃是由华原至三川。然而天宝十五载杜甫一家的逃难路线为:奉先(今陕西蒲城)—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彭衙

同家洼(今白水县史官镇南彭衙村)—三川(今富县吉子现乡)—鄜州羌村(今富县大申号村),可见此次逃难虽确实经过三川,但却并未经过华原(今陕西耀县)。那么有没有可能像黄鹤所说那样,杜甫此次逃难从奉先、白水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坊州、三川、鄜州呢?经考察后可以发现,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奉先、白水均在华原之东,且纬度较之华原尚偏北一些,杜甫断不会在逃难途中携带家小迂回绕路向西偏南的华原兜圈子耽误行程,而是直接沿着驿道从奉先北行至白水、彭衙,以至三川、鄜州。那么杜甫只身从长安去奉先接家小,是不是有可能先北上华原,然后再东行至奉先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杜甫的路线是长安、华原、奉先、白水、三川,然《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云“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表明其从华原至三川之间皆遭水灾,然而杜甫从奉先至白水这段路程显然并未遭遇水灾,这便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所载出现矛盾。从路线的便捷性来看,即便杜甫从长安北行,走的也是泾阳、三原、富平、奉先这条官道,不必北行至华原。通过杜甫天宝十四载冬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知,其由长安至奉先的路线为:从长安往东到骊山,然后往北渡过渭水,再北行抵达奉先。故而天宝十五载五月杜甫从长安去奉先走的应该也是这条老路,其大概率不会取道华原。因此天宝十五载夏杜甫的逃难路线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所载不能相符,二者必非同一次行程。为了说明此次杜甫逃难线路,笔者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所载《唐代关内道交通图》上做具体标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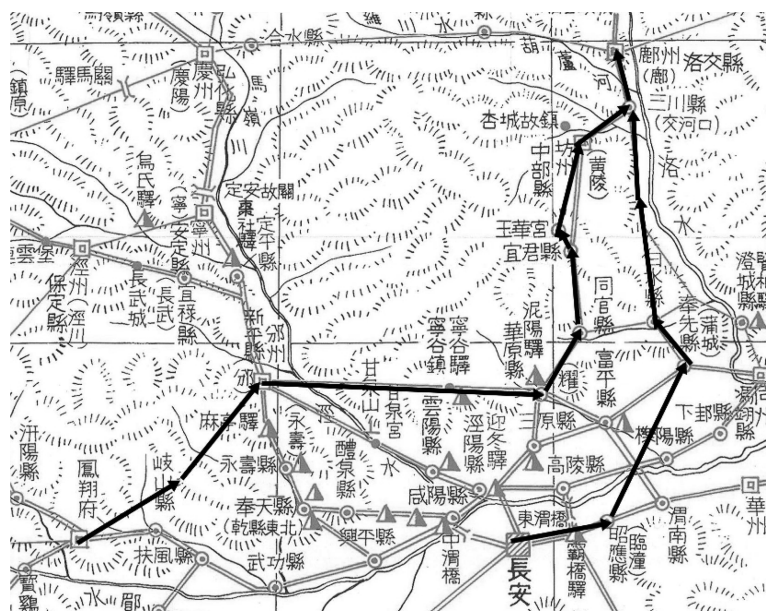


图1 杜甫逃难及北征路线图①

第二,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中并无天宝十五载夏三川及其附近地区发生水灾的记载,故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存疑。

第三,《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并未提及携带家属逃难,似为诗人另外一次行程。

综上所述,杜诗旧注对《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编年存疑,宋本杜集中题下注并不可从。细绎诗意可见,《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记述的极有可能是杜甫另一次由华原去三川的经历,而非安史之乱初起时携家逃难那次途经三川。

## 二、诗史互证视角下《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实际作年

诗史互证法一直是解决杜诗学难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进一步确证《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实际作年。

### (一)从史籍所载水灾推测《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可能之作年

杜甫在诗中描述的三川水灾非常严重:“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遵循“诗史互证”的方法,应去史籍中寻找关于水灾的记载,与杜诗进行互证,从而确定此诗之编年。检《旧唐书·五行志》曰:

(开元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鄜州雨,洛水溢入州城,平地丈余,损居人庐舍,溺死者不知其数。二十一日,同州损郭邑及市,毁冯翊县。……是岁,天下六十三州大水损禾稼、居人庐舍,河北尤甚。十八年六月乙丑,东都灋水暴涨,漂损扬、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漕渠斗门,漂损提象门外助铺及仗舍,又损居人庐舍千余家。<sup>[8]1358</sup>

《新唐书·五行志一》曰:

开元二年五月壬子,久雨,禁京城门。十六年九月,关中久雨,害稼。

天宝五载秋,大雨。十二载八月,久雨。十三载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sup>[6]876</sup>

《册府元龟·帝王部·弭灾第二》曰:

(开元)十六年九月,以久雨,帝思宥罪缓刑……两京及诸州系囚,应推徒已下罪,并宜释放,死罪及流各减一等。

天宝十二年八月,京师连雨二十余日,米涌

贵。令中书门下就京兆、大理疏决囚徒。

肃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帝令恤狱缓刑,诏三司条件疏理处分。甲戌雨止。<sup>[10]</sup>

从地域来看,以上这些记载中能 and 杜甫及三川扣上的水灾有开元十五年(727)、十六年(728),天宝十二载、十三载,至德二载(757)这五次,以下分别论之。

史籍所载开元十五年七月鄜州、同州的大雨以及开元十六年关中久雨,这都包括了三川在内。开元十五年、十六年杜甫方十六七岁,正在洛阳或偃师。杜甫开元十八年(730)曾游山西郇瑕,则开元十五六年游渭北诸县似亦有可能,且《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并未提及战乱,则作于安史乱前似亦可讲通。循着这条思路,不禁让人联想到其父杜闲曾任武功尉和奉天令,杜甫少年时期或曾由洛阳出发前往武功(今咸阳武功县)、奉天(今陕西乾县)的经历。然而从方位来看,武功和奉天均在长安以西,而三川在长安以北,少年时代的杜甫缺乏前往三川的理由,故而将杜甫的三川之游置于开元年间终究渺茫无据,难以成立。

笔者此前曾经推测,杜甫天宝十载冬曾作《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其由华原至三川或即同年之经历<sup>[11]</sup>。然史籍中并无天宝十载三川及周边有大雨或水灾的记载,故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亦对不上号。而天宝十二载长安那场二十余日的雨灾,三川亦有可能遭遇水灾,杜甫是年游三川虽有可能,然杜集中却并没有任何记载。天宝十三载秋那场持续六旬的淫雨,杜甫正居于长安,《九日寄岑参》《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秋雨叹三首》等诗中对这场雨灾均有表现,可见天宝十三载杜甫被秋雨困于长安城内,并无北游三川之可能。

那么至德二载这场雨灾能否和《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相关联呢?据《册府元龟》所载,至德二载三月确有持续大雨,然却并未记载这年秋天有过大雨,不过这一缺载恰好可由杜诗所记进行补充。至德二载八月,杜甫被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临行前所作《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得云字》云:

田园须暂往,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sup>[1]465</sup>

又《北征》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sup>[1]480</sup>由杜诗可知,至德二载

秋风翔的雨很大,持续的时间也很长,至闰八月初一杜甫北征时方告晴,这种雨情应足以造成水灾,三川的水灾亦可由此推知,因此杜甫是年秋到三川遭遇水涨极有可能。陈贻焮指出,杜甫此次北征路线为:凤翔(今陕西凤翔)—麟游(今陕西麟游)—邠州(今陕西彬县)—宜君(今陕西宜君)—鄜州(今陕西富县)<sup>[12]</sup>。韩成武亦云:“离开麟游向北行70里,到邠州(今陕西彬县)。由邠州向东北行210里到宜君(今属陕西)。”<sup>[13]</sup>然而关于杜甫如何由邠州至宜君,历代注家均语焉不详,并未认真检核唐代道路的实际情况。今检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曰:

华原西北至宁谷镇及宁谷驿八十里,由镇又西二百里至邠州。此邠州东通同州及渭南道也。华原又北五十里至同官县(今铜川东北)……县北历峡盖四十里至宜君县(今县西南),符秦置宜君护军。县北四里凤凰谷,置玉华宫,废为寺,玄奘译经处……宜君又北百里至坊州治所中部县(旧中部县南,近改黄陵)。

……

则华原置驿,不但北通坊州,且为东西驿道及渭南驿道之冲也。<sup>[14]</sup>

可见唐代邠州和宜君之间并没有直接连通的官道,由邠州前往宜君并不能直接向西北行进,须先由邠州东行至华原,然后再北上宜君。华原为长安北部东西南北之交通枢纽,由华原北行,经同官、宜君、坊州、三川,方能抵达鄜州羌村,这就是杜甫此次北征的行进路线。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云“我经华原来”,表明他此次确实是经华原而至三川,走的正是这条道路,这其实已是杜甫第二次途经三川了。然而宋代注家仅注意到杜甫天宝十五载夏那次逃难需经三川,却忽略了至德二载杜甫由凤翔北征时再次途经三川,故而出现系年错误。

还应指出的是,杜甫此次由凤翔去鄜州省亲之所以会取道麟游、邠州、华原、三川这条路线,还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据《资治通鉴》记载,至德元载七月,陈仓令薛景仙被任命为扶风太守,“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sup>[15]7105</sup>;至德元载八月,“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sup>[15]7113</sup>。至德二载,唐军与叛军在长安附近相持,互有胜败。五月,郭子仪败于清渠。《通鉴》载:“(七月)辛未,御史大夫崔光远破贼于骆谷。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将二千人攻中渭桥,杀贼守桥者千人,乘胜至苑门。贼有先屯武功者闻之,奔

归,遇于苑北,合战,杀伯伦,擒椿送洛阳。然自是贼不复屯武功矣。”<sup>[15]7149</sup>杜甫闰八月初一由凤翔北征鄜州时,叛军在唐军的打击下虽然已放弃武功,将战线收缩至长安近郊,武功已为唐军所控制,但杜甫此次仍不敢往东取道武功,而是直接北上麟游、邠州。不过由邠州至宜君仍需往东行经华原,华原南距长安仅160里,原为叛军所据,万幸的是杜甫北征之时叛军已经收缩至云阳(今属陕西泾阳)以南,华原已为唐军所控制,故其方能从邠州向东取道华原,再从华原向北前往宜君,经坊州至三川、鄜州,这便是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开篇即云“我经华原来”的现实背景。

## (二)《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未涉及安史之乱原因分析

既然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一诗作于至德二载秋,那么其中为何并未提及战乱呢?是不是编年有误,应编于安史之乱以前呢?对此问题需要稍加分析。

无论是像旧注那样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还是将此诗编于至德二载秋,此诗均作于安史之乱以后。天宝十五载夏杜甫携家小逃难,倘若逃至三川时又值水涨,可谓天灾人祸,交相荼毒,诗人值此惨绝境况,必然感慨万千,在诗中应将天灾与人祸并提才是。同样地,若作于至德二载秋,同样也是安史乱后,此时长安尚未恢复,杜甫又因疏救房琯被肃宗冷落,墨制放还鄜州省亲,倘若至三川遇到水涨,诗人似乎也应在描写天灾的同时,兼及对战乱的感慨。然而通观此诗,仅描写了水灾的声势、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受灾民众的同情,却并未言及安史之乱,这到底是何原因呢?为释此疑,我们不应再局限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这一首诗之内,而是应将目光放大到杜甫整个北征途中所作系列诗歌。从此次北征路线来看,《九成宫》作于麟游,《徒步归行》作于邠州,《玉华宫》作于宜君,《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作于三川,这些诗歌均作于同时先后,并且构成了杜甫完整的北归路线。《九成宫》云:“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天王守太白,驻马更搔首。”<sup>[1]472-473</sup>诗中明确提及当时的战乱及肃宗凤翔行在,而至宜君所作《玉华宫》云“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sup>[1]474</sup>,完全未涉及战乱时事。因此《三川观水涨二十韵》集中笔墨写水灾,不及战乱,亦是同理。也就是说,杜甫在北征途中,不一定非得首首都写战乱,既然这些内容在其他诗中已经有所表现,便没有必要在这

首描写自然灾害的诗中再掺入战乱的内容,故而《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虽作于安史乱后,却并未直接提及战乱。然而有些旧注家因对宋本杜集中的题注“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信而不疑,以为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初起之时,故而努力从诗句中钩稽出战乱信息,如清初卢元昌曰:

时禄山作乱,神州有板荡之象。篇中云:“声吹鬼神下”,阴长阳消也;“势阅人代速”,世事沧桑也;“何以尊四渎”,无复朝宗也;“反惧江海覆”,中原陆沉也;“云雷屯未已”,建侯不宁也;“普天川无梁”,拯挽无人也,语意显然。<sup>[16]</sup>

卢氏将诗中所写水涨情景逐一与安史之乱进行联系比附,诸如由水涨联想到“神州板荡”,又由“云雷屯未已”牵扯到“建侯不宁”等,其论显得过于凿实,实不足取。然而若了解此诗作于至德二载的历史背景后,当能体会杜甫于三川目睹水涨时的沉重心情。当此神州板荡、战乱未休之际,又遭如此天灾,百姓葬身鱼腹,真可谓祸不单行。杜甫在《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虽未直接提及战乱,但诗中那些江海荡覆、阴气黢黯的压抑景象,正是战乱和天灾共同投射于诗人心灵上的曲折反映。

### 三、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系于至德二载后对认识理解 杜甫北征经历及相关诗歌的意义

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一诗系于至德二载秋北征途中,这个编年的确定对于认识了解杜甫此次北征路线及其途中经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补充了杜甫北征路线中一直缺失的一环,即华原。此前学界因不能明了杜甫此次北征如何从邠州至宜君,在提及北征路线时均忽略了华原,如《杜甫全集校注》曰:“杜甫此行,离凤翔,经麟游、邠州、宜君,到鄜州,按《元和郡县图志》,全程约七百里,黄土高原,崖谷出没,行期当十天半月。”<sup>[3]943-944</sup>不知从邠州至宜君必须取道华原,“全程七百里”之说与《羌村》“归客千里至”之句亦不能相符,其论必有误。其在计算邠州至宜君的里程时测算的应是两者间的直线距离,殊不知由邠州去宜君须向东取道华原再北上宜君,这无疑要多走近百里的路程。此外,杜甫北征行至华原至三川段时遭遇水涨,必会延误不少行程,“行期当十天半月”之判断恐误。《徒步归行》题下原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

州作。”<sup>[1]469</sup>诗曰:“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柝上追风骠。”<sup>[1]470</sup>可见杜甫从凤翔至邠州的二百五十余里均为徒步,至邠州后方从李嗣业军中借到马。即便不考虑地貌复杂、天气多变等因素,以正常人的步行速度,从凤翔至邠州便需十天左右。今又知其行至华原至三川一段时遭遇水涨,加之在沿途又先后瞻仰了九成宫、玉华宫等遗迹,这些均需耽搁不少行程,因此十天半月是断难到达鄜州的。《羌村三首》其一曰:“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sup>[1]476</sup>其二曰:“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sup>[1]477</sup>杜甫于闰八月初一从凤翔启程,途经千里之遥,归家后已是北风劲吹的冬令时节,可见其北征所耗时间之长。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曰:“初吉发凤翔,经邠往鄜。计程约在中旬向后,故夜深见月,证以《羌村》诗,初到家而言萧萧北风劲,则此时去下弦不远。”<sup>[17]</sup>胡先生虽亦注意到了《羌村》诗中“萧萧北风劲”及深夜见月等季节信息,然彼时尚未考虑到此次北征于三川遇水涨之事,故其“中旬向后”之判断亦稍显乐观。洪业曰:“我们不知道杜甫抵达羌村的具体日期,但不可能太晚于九月末或十月初。”<sup>[18]</sup>其将杜甫北征时间估算为一个月虽庶几近之,然“不可能太晚于”云云亦未考虑到三川阻水因素,恐怕与实际情况仍有差距。考虑到杜甫此次北征不仅路途漫长,且从华原开始便阻水难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川,其途中花费的时间应不止一个月。

另外,学界对杜甫此次省亲时间过长的原因还有从政治方面进行解释者,如邓小军指出,杜甫《收京三首》其二曰:“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sup>[1]513</sup>诗中的“哀痛诏”是指至德二载十月一日《收复西京还京诏》及十月二十八日《收复京师诏》,是时杜甫仍在鄜州,则其省亲已经接近一百天,这已远超《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所规定常规假期不得超过三十五日的期限。邓先生据此认为,肃宗放归杜甫将近百日,将其完全排除在收复两京的重大政治进程之外,意在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职<sup>[19]</sup>。今若了解杜甫北征途中的实际状况后,当会对杜甫此次省亲时间过长的原因有一些新的认识。因为杜甫北征途中需绕行华原并于三川遭遇水涨,耽搁了不少行程,然而这些都是自然因素,和肃宗并没有关系。杜甫绝不可能在吏部规定的三十五日之内返回朝廷,意其离开凤翔之前已有所预料,故朝廷此次对杜甫归期要求应并不严格,当此战乱之际严格执行

吏部假宁之节的规定亦不符合常理,可见对《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准确编年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

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编入杜甫北征的系列诗歌中,与同时期所作其他诗歌对照合看,还可加深对相关诗歌的理解。如若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反观《北征》,便可发现《北征》诗中提及行经路线时仅提及一头一尾,“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漾”是写邠州,“坡陀望鄜峙,岩谷互出没”则已至鄜州,中间并未提及麟游、华原、宜君、坊州,更未提及三川水涨。杜甫在《北征》诗中之所以并未全面细致地描摹北征路线,或许是因为创作的高峰体验不可重复之故,他既然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已经对三川的水灾进行了细致描摹,为避免重复,故在《北征》诗中便不再涉及,这种处理方法颇有“互现法”的意味。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乃是对《北征》的侧面补充,正可以作为《北征》的背景板之一,当然《徒步归行》《九成宫》《玉华宫》等诗同样也是如此。此外,旧注均未将《北征》“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与时事相联系,谢思炜指出,此句杜诗“所指究竟是哪场战事?何时发生?规模如何?均无从考究。只有等待更全面的调查”<sup>[20]</sup>。今若得知杜甫此次北征途经华原,而如前所述,唐军于杜甫北征前不久刚刚与叛军在华原一带激战并控制了此地,则杜甫“夜深经战场”之“战场”不排除为华原附近之可能。又如《晚行口号》曰:

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饥鸟集戍楼。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sup>[1]466</sup>

因诗中提到了“丧乱”,必作于安史乱后,历代注家也据此将其编于杜甫北征途中。诗中称“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显然尚未抵达三川,然而应已接近三川,大约作于华原至三川途中。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可知,从华原往北一直到三川皆遭水灾,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此诗颔联亦提到了水,不禁令人怀疑诗中描绘的一片荒寒肃杀情景或许也与水灾有关。仇注引邵注曰:“不可到,徒步行缓也。”<sup>[1]466</sup>按,邵注实误。如前所述,杜甫此次北征,从凤翔至邠州确曾徒步,然至邠州后他向李嗣业借到了马,此后便不再徒步。“三川不可到”之因,实由水涨造成,并不是因为徒步行缓。浦起龙注曰:“此将到时作。将到而反恨途长,反嫌日晚,远归心急人,确确如此。”<sup>[21]</sup>今若得知北征途中于三川遇水涨之事,则“三川不

可到”除了归家心急之外,应该还有道阻难通之意,“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二句正可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相互印证,故浦氏“将到而反恨途长”之论似可修订为“将到而反恨道阻”。因“市朝今日异”的下句为“丧乱几时休”,故旧注多以下句解上句,如边连宝曰:“市朝之异,以丧乱故耳。”<sup>[22]</sup>其将“丧乱”直接理解成战乱虽无误,然若了解三川水涨这一背景后,这个“丧乱”亦应包括灾情在内,则“市朝今日异”不仅与战乱有关,亦可能与水涨有关,此前不明之涵义至此可以得到落实。

## 结 语

宋代注家关于杜诗编年的依据存在不少问题,如笔者曾指出,旧注中编于天宝五载至天宝七载的杜诗,其编年依据大多不能成立<sup>[23]</sup>。而宋人对《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的编年依据亦存在类似问题。宋本《杜工部集》的编者王洙因注意到杜甫天宝十五载夏北上逃难途中必经三川,遂误将此诗系于此时。宋代注家据王洙题注及《新唐书·杜甫传》所载“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进一步将此诗明确系于天宝十五载七月,这一系年此后为历代注本辗转相沿,以迄当代。由于此类编年中存在的失误不易察觉,故而并未引起当代学界的充分质疑。然而史籍中并无天宝十五载夏三川发生水灾之记载,且诗中所载华原至三川这一行进路线与天宝十五载夏杜甫一家的逃难线路并不相符。今据新、旧《唐书·五行志》《册府元龟》及杜诗所载可知,至德二载秋凤翔乃至关中地区曾有多日霖雨,而杜甫于是年闰八月初一开始北征,恰好再次经过三川,故《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应作于此时,此次杜甫的北征路线为凤翔、麟游、邠州、华原、宜君、三川、鄜州。由于此前学界未能细考杜甫由邠州至宜君之间的具体交通线路,以为两地直接可通,忽略了华原乃杜甫由邠州至宜君的必经之地,从而导致一直未能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我经华原来”之句与杜甫至德二载秋的北征路线相关合。

今通过诗史互证后发现,应将此诗的作年修订为至德二载秋,即杜甫第二次途经三川之时,如此方将杜甫北征路线中一直缺失的一环“华原”补充完整。这个完整线路的补足,不仅可以加深对《北征》这一名篇创作背景的认识,亦有助于重新理解《北征》诗中的相关诗句及此次北征途中的其他诗歌。

此外,搞清杜甫此次北征的行经路线及途中经历,亦有助于消除此前学界的某些误解。比如我们知道杜甫此次北征需从邠州往东绕经华原,再北上同官、宜君、坊州,从华原往北的道路已泥泞不堪,至三川又遭遇水涨,杜甫一路走得甚是艰难,抵达鄜州羌村时已是初冬时节,其间耗费的时间应不下月余,此前学界“十天半月”即可到羌村之判断并不准确,其论应予以修正,这或许正是对杜诗进行准确编年的意义所在。

### 注释

①该路线图系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所载《唐代关内道交通图》进行标注。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后所附插图。

### 参考文献

- [1]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全五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47.  
 [3] 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全12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 吕大防.杜工部年谱[M]//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9.  
 [5] 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M].彭燕,胡永杰,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24:112-113.  
 [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601.

- [8]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元好问.中州集校注[M].张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269.  
 [10]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校订本[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616.  
 [11] 孙微,王新芳.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7-24.  
 [12]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中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7.  
 [13] 韩成武.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68.  
 [1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32.  
 [1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 卢元昌.杜诗阐[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69.  
 [17] 中华书局.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9.  
 [18]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M].曾祥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0.  
 [19]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郾州考:下[J].杜甫研究学刊,2003(2):12-20.  
 [20] 谢思炜.把生命托付给诗歌:杜甫诗歌十讲[M].香港:尔雅文化出版社,2025:184.  
 [21] 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7.  
 [22] 边连宝.杜律启蒙[M].韩成武,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25:44.  
 [23] 王新芳,孙微.杜甫困居长安初始时间新考:兼论天宝五至七载杜诗的重新系年[J].中州学刊,2024(10):143-153.

## “I Came by Way of Huayuan”: A Missing Link in Du Fu’s Northern March

### —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ating of “Twenty Rhymes on Viewing the Raging Waters at Sanchuan”

Sun Wei Wang Xinfang

**Abstract:** Most traditional annotations date “Twenty Rhymes on Viewing the Raging Waters at Sanchuan” to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15th year of the Tianbao reign, holding that it was composed when Du Fu fled northward from Fengxian. However, the line “I came by way of Huayuan” in the poem is clearly inconsistent with Du Fu’s escape route in that year, and no historical records document a flood in Sanchu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summer of that year.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Book of the Tang and The Old Book of the Tang* (Treatise on Five Elements), *CeFuYuanGui*, and relevant records in Du Fu’s poems, it can be known that five flood events—in the 15th and 16th years of the Kaiyuan reign, the 12th and 13th years of the Tianbao reign, and the 2nd year of the Zhide reign—are associated with Du Fu and the Sanchuan region. Among them, the rain-induced flood in the Guanzhong area in the autumn of the 2nd year of the Zhide reign is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for the creation of “Twenty Rhymes on Viewing the Raging Waters at Sanchuan”. Du Fu set off on his northern march from Fengxiang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Zhide reign, passing through Sanchuan on the way. His route for this northern march was Fengxiang, Linyou, Xingzhou, Huayuan, Yijun, Sanchuan, Fuzhou, which aligns perfectly with the line “I came by way of Huayuan” in the poem. Traditional annotators failed to accurately date the poem because they did not conduct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n Du Fu’s specific route from Yongzhou to Yijun and were unaware that Huayuan was a necessary stop on the road from Fuzhou to Yijun. Clarifying the composition date of this poem not only enable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te route and experiences of Du Fu’s northern march, further deepe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poems such as “The Northern March”,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documentary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to clarify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eliminate previous misinterpretations.

**Key words:** Du Fu; Twenty Rhymes on Viewing the Raging Waters at Sanchuan; dating revision; Huayuan; The Northern March

责任编辑:知 然